

将《文艺报》送回家

□束沛德

《文艺报》是我文学与人生之旅中真挚、贴心的旅伴。我们手拉手，心连心，一起走过了70个春秋。

5年前，我写过一篇《与我一路相伴的《文艺报》》，记述了我与《文艺报》难解难分的情缘。即将迎来《文艺报》70华诞之际，我想从读者、作者、编者三个层面简略地说一说我与它之间的情谊。

我是《文艺报》的一个忠实读者。跨入大学门槛不久，恰逢《文艺报》诞生。尽管囊中羞涩，我还是咬咬牙，从有限的零花钱中挤出一元钱订阅了《文艺报》。从那时到今天，《文艺报》始终伴随着我。随着工作的调动，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石家庄，再回到北京，不知多少次搬迁，不少书刊我都忍痛割爱了，唯独一份《文艺报》一直紧随在身，舍不得丢

弃。我读《文艺报》，每当从中读到自己喜欢的、有深度的文章，看到自己钟爱的、有新意的栏目、专刊，或引人思考的创作、理论问题讨论，我会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而每当发觉《文艺报》的内容、版面不尽如人意时，又不禁摇头叹气，为之惋惜。一有机会，比如作协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我曾多次直率地提出批评和建议。我真诚地关注《文艺报》的成长、进步，期盼它越办越好，赢得更多的读者。

我也算是《文艺报》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作者。上世纪50年代，我在《文艺报》发过两篇多少有点影响的儿童文学评论，其中《情趣从何而来》一文，至今被论者和文友看作我的“代表作”、“充满创见”、“卓尔不群”的作家作品评论。正因为这两篇文章，在80年代中国作协书记处分工时，让我联系儿童文学界，从

而有机会经常与《文艺报》“儿童文学评论”栏目打交道，在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粗略算来，先后在《文艺报》发表的长短不等的评论文章可能有四五十篇。加上散文随笔，也许就不止70篇了。近两个月，我就在《文艺报》接连发了《七十年儿童小说花团锦簇》《七十年童话创作多姿多彩》，以及评介李东华《焰火》的书评，还有一篇往事纪实《1953年中国文坛一大盛事》。如此密集地频频亮相，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该算是积极的了吧。

我还是一个与《文艺报》擦肩而过、未能如愿上岗的编辑。我是学新闻的，又爱好文学，《文艺报》可说是我心驰神往的一个工作岗位。1978年作协恢复工作，我回到文学队伍。时任作协负责人、也是《文艺报》主编的冯牧让我到编辑部读作品、拟选题、组织文章，自己也

动手写。应当说这是一个符合我的兴趣、愿望，也是可以发挥我的潜能的一个岗位。可是由于作协另一位负责人李季执意让我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联络部，无奈我还是错失了这次去《文艺报》的机会。在我心目中，《文艺报》是个锻炼人、培养人、出人才的地方。这辈子的无缘到《文艺报》当个编辑，我至今还引以为憾哩！

我没想到《文艺报》编辑部竟没有一套从创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艺报》。这些年来，编辑部曾不止一次地从我处借用某年某月的报纸。在它的70岁生日前夜，我决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艺报》（1949—2019）悉数捐赠给编辑部。当我把分散在房间犄角旮旯的这些报纸集中到一起，面对它们，真还有一缕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更为它们终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归宿而欣慰。

感恩《文艺报》

□公仲

《文艺报》已创办了70周年，回想起来，我跟着她也有40年光景了。现在追忆我和《文艺报》的一些往事，倍感亲切流连。

1980年夏，在庐山开了个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原称没有“高校”两字，后低调处理，加上去的）。这次会议规模空前，到会达480人，把山上当时几乎所有的宾馆饭店都包下来了。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文艺报》等联合主办，由江西省文联、江西大学具体经办。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首次举行的专门的文艺理论大会。主持人是陈荒煤，到会的有丁玲、王元化、王西彦、徐中玉、钱谷融、廖俊杰、阎纲、吴介民、何洛、李云杨、江晓天、梁信、吴强、白桦、公刘、俞林、李定坤、朱明等。会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我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负责会务与接待工作。此间就与《文艺报》的阎纲认识了。他拿了好几本《文艺报》给我看。当时那还是个月刊杂志，发表的大都是名人大家的长篇大论。我如获至宝，细读后大开眼界，大长学识。心想，这《文艺报》才真是良师益友，我可终身受用不尽。

下山后不久，阎纲又来到南昌开会，我去看望了他。我们谈得很欢，他来自大西北蛮荒之地，与江西这老少边穷的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必须要能站在家门口，看到天安门，走到天安门，看到全世界。像你，不能只是埋头教书，还要多看书，多写文章，贴近生活，关心社会。我心领神会，点头称是。就在我起身告别之时，他突然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差一点忘了一事。他问我知道老作家陆地否？我说道，刚看了他的新长篇小说《瀑布》。他即说，这就正好，我们正想为他的这个长篇组织一篇评论文章。就你来写，行吗？我顿时吃了一惊，毫无思想准备。我就是个教书匠，在大学教当代文学，这些年，在省里报刊也写过一些文章评论，近日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但从未在这样全国性的文学报刊写过文章，不禁慌张犹豫起来。他见状笑了，说不用迟疑，这是好事呀！心想，这是《文艺报》对我的关照，机会难得，就答应下吧。他高兴了，说很好，三天会议结束后，我带稿子走人。我一听吓了一大跳！三天？评一个长篇！我可没有这个能耐，不停地摇头叫苦。他叹息道，你们地方上懒散悠闲惯了，我们可是加班加点，家常便饭。人就是要有点拼搏精神，你还年轻，抓紧拼一下吧。三天不能带走，邮寄就是特快也赶不上，我回去就要上版啦。听他这么一说，我无言以对，暗暗咬牙，决心就这么干了。他接着又补了一句：“写得可要有些分量呀！”这分量，我理解就是字数不能少，分析要有水平。他还在给我增压，我无退路了，只能尽我所能地拼吧！我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拼了三天三夜，准时将文稿当面交给了他。他来不及审阅，拿了文稿就赶路去了。不到两星期，他来电说，文稿已作为要目发表了。我得知，简直欣喜若狂。又过了一些日子，忽然收到了一封不知是谁的来信，封面毛笔正楷，苍劲有力。打开一看，竟是老作家陆地的亲笔信。他非常诚挚地向我道谢，并说对他小说的评析合情合理，他完全赞同。我受宠若惊，羞愧难言。而在这时，江西省人民政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破天荒地设立了一个优秀文学评论奖。我这篇评论文章正赶上评选，竟被选上获奖了。我深知，其实我文章的分量是不够的，是《文艺报》的分量重如泰山。从此，我与《文艺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7年，《文艺报》与《解放军文艺》联合在井冈山举行了一次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研讨会，邀请我参加。吴泰昌、孙武臣、冯立三都来了，部队的王愿坚、莫言也到了。我还陪吴泰昌下山去了趟永新，专访他童年在永新生活过的教会孤儿院。对于此会，《文艺报》做了个综述报道，还办了一次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笔谈。我也谈了一些意见，写了一些文章。后我将我那些散乱的文章汇集起来，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自选文集《当代文学纵横谈》，吴泰昌特地为此书写了篇序言。我深为感谢。

1989年，我与汪文生合写了一本《台湾文学史初编》的书，艾青写了序，《文艺报》专门为此书开了座谈会，会上冯牧说，此书“是同类著作中的上乘之作”。《文艺报》即做了报道，更叫我感激不尽。此书后获江西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1年，我写的一个电视剧《井冈山之子》，在中央台播出了。之前，在审片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主要是说影片写了井冈山斗争后期遭到的挫折和困难。陈荒煤及一些亲自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力排众议，终促使电视剧得以播出，但闲言碎语仍不断，我的压力不小。这时，《文艺报》顶着压力，在1991年4月13日发表了陈荒煤的署名文章，力挺《井冈山之子》，说“结局写了挫折、教训、离别之情，显得低沉凝重，这是富有深意的，说明我们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革命道路也有坎坷、曲折和千难万苦，青年人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更珍惜今日革命的胜利。”《文艺报》此举，对我是极大地支持和鼓励，真叫我感激涕零。

90年代直到新世纪，我与《文艺报》的联系一直不断。前后得到雷达、李维永、王杨等人耐心的指导帮助，我没齿不忘。可以说，《文艺报》是我的恩师，40年来，我就是在她的关爱、扶持下成长起来的，我将伴她而行，直到生命的终结。

我是《文艺报》的朋友

□刘文飞

我敢于自诩为《文艺报》的朋友，当然是因为自己跟这份报纸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为这份报纸撰稿，我今已发小文数十篇，是长期得到《文艺报》关照的一位作者。在我成为中国作协会员之后，这十几年来一直获得《文艺报》赠报，我几乎每期必看，是《文艺报》最忠实的读者之一。

我与《文艺报》的朋友关系，首先体现为与该报“世界文坛”版的亲近。记得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外文所遇见该栏目编辑李维永女士，她知道我刚刚去过一趟莫斯科，便问有没有什么文艺现象可以为刊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她闻之显得很兴奋，约我写一篇文章，我便写出了《时代呼唤它的艺术代言人——维索茨基现象的思考》一文。我的文章由“维索茨基之路”“维索茨基之谜”和“索茨基之启示”3个小节构成，介绍了维索茨基集演员、歌手、诗人等为一身的艺术角色，维索茨基在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社会享有的巨大声誉和影响，对“维索茨基现象”的本质进行了阐释，并呼唤中国的维索茨基的诞生。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黄宗江先生看到此文后打电话到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外文所，与办公室人员约定了时间，在我上班的时候他再打来电话，记得我们聊了很久，他详细了解了维索茨基的情况，并发出一阵由衷的感慨；又过了几天，我在外文所的老师辈

1977年初夏，高中毕业前夕，我与几位要好同学鬼鬼祟祟讨论的话题是，去哪里插队落户。不久以后传来消息，高考恢复了。我们10月份开始准备考试，11月份稀里糊涂参加初试，12月份杀进复试考场。转过年来，我收到了一份入学通知书。

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的中小学时代在“文革”时期度过。成为中文系本科生的时候，我从未听说过巴金的名字，也不知道沈雁冰就是茅盾。除了看过几期“文革”时期出版的《工农兵画报》之外，从未接触过任何文学期刊。幸运的是，我们很快赶上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那些令人亢奋的日子。人学不久，从春天到夏天，《哥德巴赫猜想》《于无声处》《伤痕》等作品所引起的一阵又一阵文学骚动，让我们进入大学后的每一个日子都满溢激情和幸福。思想解放的进程和文学生活的恢复与重建，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初入大学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记得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采取群众、文艺团体、文学出版机构推荐和专家评定相结合的评奖方式。我们小组的几位同学群情激昂，唇枪舌剑，集体推荐了30篇作品。待到评奖结果揭晓，大家对照25篇获奖小说名单，发现竟有17篇作品在我们的推荐篇目中，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只是无名的普通投票“群众”，但大家恍若都中了“参与奖”一般欣喜无比。

我那时候年纪小，入学时16岁，在一群老大哥老大姐面前最显无知和幼稚。不过，生性比较内向，也容易给人造成错觉，用给我们上英语课的先昆老师的说法，“方卫

同事童道明先生在上班时告诉我，于是之先生也读了此文，称是好文，并请童老师转达他对此文作者的谢意。一篇小文章居然引起了于是之和黄宗江这样的大艺术家的关注，这让我在窃喜之余也感受到了《文艺报》在中国文艺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李维永女士退休后，我和《文艺报》“世界文坛”的关系却持续了下来。俄国文坛的新情况、俄国作家的来访和中国作家的访俄、俄国文学在中国的最新传播，以及俄国文学的译介体会等等，每每成为我和编辑王杨的交谈话题，后来也往往会成为刊发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是，在编辑的督促下，我于2017年1月起在《文艺报》上开辟了“西山晨语”专栏，每月一篇，陆续发表了《我们的“文学自信”》《再读普希金》《祖列依哈的世界》《两家〈十月〉的握手》《俄语文学的性别变迁》《狂野俄罗斯》《二十一世纪的俄国长篇小说》《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力冈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等十余篇短文，虽然当时写得很苦，每月临近交稿的时间都会惴惴不安，但到年底，回过头去看那十余篇文章，心头还是有一种满足感的。我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再加上自己陆续写作的其他散文和随笔，拟以《西山晨语》为书名出版一本小集子。

我是《文艺报》的读者，是《文艺报》的作者，也是《文艺报》的朋友，是《文艺报》“世界文坛”版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文艺报》结交到了更多的朋友，他们或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或为《文艺报》的其他作者和读者。我因拥有《文艺报》这样一位能给我巨大帮助和不断鞭策的良师益友而自豪！

相伴四十年

□方卫平

部的信，因为地址不详被退了回来。

就在我写上述日记的两天前，在10月30日的日记里，我记下了这样一句：“文艺工作者四次代表大会在京开幕。”熟悉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次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12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在市区买到《文艺报》第11、12期合订本和朱德生、李真主编的《简明欧洲哲学史》。”

所谓的“合订本”其实是合刊。这一期《文艺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专刊，内容丰富、有趣、厚重，混杂着沧桑、喜气和庄严感。隐约记得封面右上方“文艺报”几个字是深绿色的，内文图文并茂。与会作家的海量照片与文字信息形成了宝贵的补充。印象最深的两幅照片，一幅是中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张洁、叶文玲、刘真簇拥着老作家冰心先生的合影，发自内心的喜悦极有感染力。另一幅是一位香港作家与翻译家、学者元宝权等的合影。时值初冬，戈先生穿着厚厚的大衣，来自南国的香港作家却身着短衫短裤，令人过目难忘。

1982年初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一所小镇中学做语文老师。两个月后，我的专业兴趣从文艺学、美学转向了儿童文学，阅读各种

伴随新中国70华诞的同时，《文艺报》也迎来了70岁的生日，我们没有亲历这份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文艺类报纸的创建，但目睹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报》的传播，感受到它给读者带来的欣赏和激励。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与《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多有联系，常常感怀这块园地上的春华秋实。

2006年秋，记得最初拟创办“少数民族文艺专刊”时，时任《文艺报》总编室主任的王山对我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文艺报社的领导经过研究，准备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版面，让他负责专版，他特为征求一下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坐在一个小饭店里，听完他的话我十分高兴，这个专版显然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又一拓展，刊登的散文、诗歌、评论各类作品可更加贴近生活、短小精悍；可加强对精品力作的评介，对文学新秀和人口较少民族作品的推荐等。王山谦逊地点头称是，并约我为这个专刊写稿。没过多久，第一期“少数民族文艺专刊”面世，以其多民族的文化信息、风格独特面貌让读者耳目一新。

此后，我陆续应约写了一些小文章，专刊为此开辟了一个《主编第一视野》专栏，后为《新视野》。我最初介绍了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青年作家群等不同民族的文学群体，继而又接连介绍了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悠久、变化巨大，色彩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学土壤，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作家常以他们的作品见证民族的变迁，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保护，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梦想追求，如同七彩之光，斑斓多姿。蒙古族诗人阿尔泰和他的诗集《阿尔泰蒙古风》，围绕着祖国、民族、人民和草原，在充满激情的抒怀和深沉的哲学思考中唱出了时代的声音、民族的心声，是我国当代蒙古族母语诗歌创作的标志性著作。《民族文学》自2009年创办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之后，许多用母语创作的作家诗人都十分欣喜，认为这是国家对不同民族的母语更为实际的一种关爱。那年我们为此分别赴内蒙古、西藏、新疆召开了翻译家作家的座谈会，曾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翻译成蒙古文的阿尔泰也一起走进了拉萨，与藏族的作家翻译家倾心交流，他用他马头琴般的音色，用他深爱的母语读他的诗：“露珠醒了，奔向灿烂的朝阳/激情醒了，投入火热的生活/醒来吧，我的诗。”我们这些不懂蒙古语的人在一旁听着，也情不自禁地被那种难以形容的魅力所感动。

生活在苍茫的青藏高原上，内心充满敬畏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他的作品剖析族人隐秘的心灵，从多种不同的角度表现出藏族人民在时代的动荡中所受到的冲击，表达出作家包容的情怀、善良的呼唤。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精通母语和汉语，他的长篇小說《时间悄悄的嘴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一个弃恶扬善、自我救赎的寓言式故事，充满维吾尔文化的幽默深邃、哲理和诗性。善于开掘生活、刻画人物的仫佬族作家肖勤，从女乡长到县长，一直工作在第一线，同时用写作表达着对家乡土地和生活的一片真情。她的成功给更多的文学人以证实，生活才是创作的源泉。经历过汶川地震的羌族诗人羊子从撕心裂肺的生死边缘走过之后，重新审视那片古老的土地和民族，在他的组诗《汶川之歌》被《民族文学》特别推荐之后，又捧出了长诗《汶川光》。

从大漠绿洲的北疆、草原冰封的雪域，到云深林茂的丛岭、稻香叠翠的南国，在中国辽阔的山河大地上，56个民族的作家诗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所讲述的故事精彩纷呈，数不胜数。《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让许多不忘初心、讴歌祖国与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进一步走入广大读者的视野，共同妆点当代文学的多姿多彩，也让无数少数民族文学新秀崭露头角。十几年来，我前后为专刊书写了数十篇文章，就如同一次次穿过多样化的河流，领略不同的风景和生活，倾听那万千气象中蕴含的声音，让我常怀感恩之心。“少数民族文艺专刊”的编辑明江、黄尚恩等多年来勤勉敬业，四处组稿，精心编校，在与他们交往的数年间深感其辛苦不易。《文艺报》创办以来，跨过新世纪，走入新时代，坚持导向、凝聚聚气，伴随祖国的脉动和文化的兴盛，共同迎来70年庆典，春华秋实，可喜可贺。

文学报刊的热情依然不减。1987年1月19日，我正为硕士毕业论文写作茶饭不思，突然收到了汤锐女士的来信，是一封诚恳殷切的手写约稿信。当天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收到汤锐从中小学发来的信，说‘文艺报今年新辟儿童文学理论版，你如有佳作望及时寄给我’。”对于正在暗暗思虑如何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小试身手的年轻人来说，《文艺报》上这个版面的开辟，该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而我与《文艺报》的缘分，也就这样拉近了。

几天后，我从已经改版为报纸出刊的《文艺报》上看到了“儿童文学评论”版的第1期。这一期上有束沛德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刊词性质的文章《窗口·桥梁·苗圃——对〈儿童文学评论〉专版的期望》，还有作家班马新意迭出的长文《当代儿童文学观念几题》。压题的则是一幅青年作家围坐一起的合影。寒假里，我在家中以缝纫机当桌，写了一篇2000字的短文，并于1月29日寄给汤锐，这就是1987年5月16日“儿童文学评论”版以头题刊出的《儿童文学：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一文。

《文艺报》创办70周年了，我作为《文艺报》的读者，与她相伴了40年；作为作者，已经超过30年。30多年来，我在这份重要的专业报纸上发表了近60篇长长短短的文字。今天，托网络时代的便利，我常常等不及几天后才能送达的报纸，在每周一、三、五的早晨打开《文艺报》电子版，浏览当天的各版内容。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来说，《文艺报》的存在，都是难以替代的。

□叶梅

春华秋实